

編後語

香港在促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早已被充分認識到了。但是，有多少人同時也認識到在過去和未來，香港對中國學術文化發展有同樣重要性呢？余英時在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談的就是這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他指出，由於香港有中西交匯的地利、確保學術自由的健全法制，以及求新不棄舊的文化風氣這三種優勢，百餘年來就成為像王韜、錢穆這些因為政治原因而離開大陸的幾代學人繼續從事學術文化工作的地方。今天，隨着香港之從傳統社會轉變為富裕的現代公民社會，並且成為中國大陸經濟通向世界的港口，「怎樣使香港成為大陸通向世界的學術和思想港口」，無疑已成為香港學術研究和文化建設的新課題。可以說，《二十一世紀》正是本着這種對歷史和未來的意識而辦的一份學術文化刊物。

我們特別要向關心中國民主化的讀者，推薦金耀基分析台灣社會邁向民主體制歷程的長文。該文不僅有對具體過程的描述，而且有社會指標分析。他認為，台灣由於經濟發展的成功而造就了一個多元化社會，儒家政治文化也經歷了重大變化而具有「公民文化」的某些特徵，使得台灣社會基本完成從一黨的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由於台灣的民主化是既無前例可依循，也不能成為民主過渡的典範，他將台灣的民主化稱為「無典範式的民主探尋」。

同金耀基所討論的問題相關的，是大陸青年學者何懷宏討論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是否能適應步入現代社會的文章。他認為，強調「為己之學」的儒家倫理，雖然適應傳統的精英等級制和威權政治，但它難以普遍化，所以不能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因此，中國應該實現由自我觀點向社會觀點、由特殊觀點向普遍觀點的轉化，開出新的社會倫理。

本期佳作甚多，楊振寧寫鄧稼先，不但有對分別領導中美兩國製造核彈的科學家鄧稼先與奧本海默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的觀察和比較，也使我們看到這位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對鄧稼先個人的深厚友情、對中華民族的強烈感情與責任心，令人感佩。作為中國當代一位具代表性、才華橫溢的作家，王蒙寫出了蘇聯文學對他們這一代的巨大影響，寫出了那個不會消失的「關於朗朗乾坤、清明世界」的光明夢。

最後，洪民的〈應該重寫中國近現代史〉顯示：每當中國社會面臨重大轉折的時候，重新寫作能超越既有意識形態的近現代史往往就會成為一種共同的期待和願望。